■ 数据解读

非制造业PMI上升不等于产业结构改善

中国GDP中服务业占比只有43.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比低收入国家45%的水平也要低一些。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上周六发布的数据，10月份的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PMI）为55.5%，环比上升1.8个百分点。

从去年10月起非制造业PMI基本处于55%-58%这样一个较高的水平。由此看出，中国经济虽然在这一年中下行，但经济结构在调整，服务经济有所提升。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41.5%提高到43.4%，提高了1.9个百分点。而最近一年服务产业的提升更是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

然而由此是否就可以说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因为上述中国产业结构得到调整的结论是含有很大水分的。这里不是说上述的统计数据含有多少水分，而是说这些数据并不足以支撑那个“中国产业结构有很大改善”的结论。

中国GDP中服务业占比只有43.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比低收入国家45%的水平也要低一些。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现在的服务业占比应该在60%左右，也就是说，目前服务业大概滞后了15个百分点以上。

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03年-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44.9万亿元，年均增长25.6%。2004年-2011年，我国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速为22.4%。

在理论上应该加快的服务业投资，实际上仍然落后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速度，这怎么能说服务经济得到增强呢？

今年最终消费在GDP比重的大幅提升，其实是相对投资和外贸下滑所引起的。前三季度，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是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

外贸出口现在已经回升，今后可能会逐渐平衡，但是负增长的局面毕竟只是偶然出现。

而中国经济要减少投资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需要减少的只是重复低效的投资。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为1万美元，而日本的人均资本存量则大约达到了14万美元，美国则为10万美元左右。因此中国需要投资。但是，一旦制造业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恢复正常，中国的服务产业却没有更大的投入时，经济结构恐怕又要回到原点。

当一个看似乐观的数据摆在面前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多方映印，对现实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非制造业PMI尽管有所上升，但距离“调结构”的目标尚远，服务产业仍需要真正的增长。而服务产业的增长还需要国内需求的扩大，归根到底还是要较大幅度地提高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

□郁慕湛（上海 学者）

■ 一家之言

“暴利税”不应与国际油价“双重”接轨

不同的时候选择“接轨”不同的“国际油价”，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双重标准呢？

在中石油、中石化的三季报中，两巨头“应缴税费”一项均出现了大幅下降，同比去年少缴的税费将超过300亿元。原因是在今年年初中石油、中石化均调整了标杆油价。因为迪拜原油价格要比杜里和辛塔原油价格低，基准油也相应变得更低，两大石油公司“暴利税”随之下降。（据11月4日《经济观察报》）

石油特别收益金是指国家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国产原油因价格超过一定水平所获得的超额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俗称“暴利税”。

之所以要对石油巨头开采石油征收“暴利税”，原因在于：石油巨头销售的成品油，其原料中有56%的部分来自进口原油，成品油价格跟随国际油价上涨的关联度却是100%；如果不对这部分开采成本低廉的国产原油开征“暴利税”，既是国家的资源损失，也是对消费者的严重不公。

国内原油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暴利税”理当同步上涨；可现实却是，国际油价只要在75美元每桶以上，无论再涨多少，“两桶油”缴纳“暴利税”的最高比例都永远不变。

换言之，国际油价涨，国内成品油价格也涨，但是“暴利税”不涨。

不仅如此，去年11月国务院又大幅提高了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从每桶40美元提高到55美元，仅此一项两桶油一年将减负近400亿元。

即便如此，“两桶油”对于直接减税的政策大礼包仍不满足，又在“接轨”哪种“国际油价”上动起了间接减税的脑筋。“两桶油”选择“国际油价”的标准，简单说就是，哪里的油价便宜就选择哪里做基准油价。基准油价越低，适用税率就越低，需要上缴的“暴利税”自然就越少。

让人想不通的是，征收“暴利税”这样严肃的事情，比照怎样的“国际油价”，确定怎样的适用税率，究竟谁说了算？“两桶油”可以自行决定更改基准油价吗？

更值得思考的是，“两桶油”缴纳“暴利税”时的“国际油价”，与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时的“国际油价”，不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吗？

不同的时候选择“接轨”不同的“国际油价”，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双重标准呢？

同样的“两桶油”，在缴纳“暴利税”与调整成品油价时，选择“接轨”的“国际油价”却可以完全不同，这样的双重标准必须改变。否则，“两桶油”的“暴利税”缴的更少，成品油价却不变甚至更高，无异于对公众在资源和油价上的双重掠夺。

□舒圣祥（湖南 职员）

新京报漫画/师春雷

■ 财经漫谭

播种如下注

新华社报道，同样是卖菜，菜农们的心情却不尽相同。卖大葱的兴高采烈，卖白菜的却愁眉不展。哈尔滨新农镇万家村一位菜农说：“现在种菜就像赌博一样，赌对了就赚点，赔了就得自己担着。”

许多菜农希望改变这种赌博似的种植，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将准确、权威的信息送到他们手里。

■ 谈股论市

放开香港IPO或使A股边缘化

两个不同的市场，围绕上市公司的融资和投资交易的方式是不同的。若真向港交所放开中小民企的IPO，A股市场的前景只能是被边缘化。

上周五，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拟取消赴港发行H股的硬性财务门槛，这位负责人说“今后只要是符合港交所上市条件的企业，都可以赴香港上市融资”。

表面看这对融资难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但这个说法存在实施的难度，即便实施了前景也未必多么灿烂。

道理简单，港交所上市的条件虽然很严格（比如对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变动的审查，又比如对公司的财务情况的审计，以及上市之后的监管等方面），但港交所对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却并无特殊，尤其是行政管制的要求。比如民营的地产公司去融资，假如达到了港交所上市的条件，证监会是否可以放行？证监会要是放行了，是不是就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现矛盾？况且，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港交所并不会因为证监会取消一些门槛而全面打开融资大门。

从交易所的性质来看，港交所和上交所、深交所并无本质的不同。一家民企若是从法律和财务的指标上满足了港交所的上市条件，它也应该能够满足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这三个交易所当然可以有市场分类，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提供自己的服务范围。比如按照目前的情况，上交所可专心为大中型国有企业服务，深交所发挥特色为较为成熟的中小企业服务，而港交所因为历史更加悠久，服务功能更强，和国际市场接轨更深、更宽泛，可以做更多更国际化的服务。

总之就资本市场建设而言，这三个交易所是各有优势的。但若只是放开港交所的管制（当然这是单方向的放弃管制），却不取消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管制，可以想见A股市场不仅难改熊市格局，市场的定位也迟早会被边缘化的。

比如这次出现的浙江世宝IPO亏损上市、却在二级市场被爆炒就是典型一例。因为有了浙江世宝港股的二级市场定位，所以这次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IPO极低的定价。表面上看是向香港较为合理的定价机制看齐，但实际上内地的监管层忘记了港交所是开放的市场。虽然都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港交所的上市流程是不需要各种行政审批，是不需要香港金管局事前行政干预的（它只事后监管）。

这样两个不同的市场，围绕上市公司的融资和投资交易的方式是不同的。浙江世宝亏损上市在港交所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后投资者对浙江世宝A股的爆炒，是对亏损上市的反弹，其对市场所造成的危害超过过去的“三高”发行（发行价、市盈率、超募资金）。因为在以往的IPO中，上市企业是赢家，但这次也成了受害者，它的亏损成了IPO利益链里的食物。

所以说，若真向港交所放开中小民企的IPO，A股市场唯一的前景就只能被边缘化，像现在这样毫无定价权就是症状。

□陈宁远（上海 财经评论人）